

L'Europe Chino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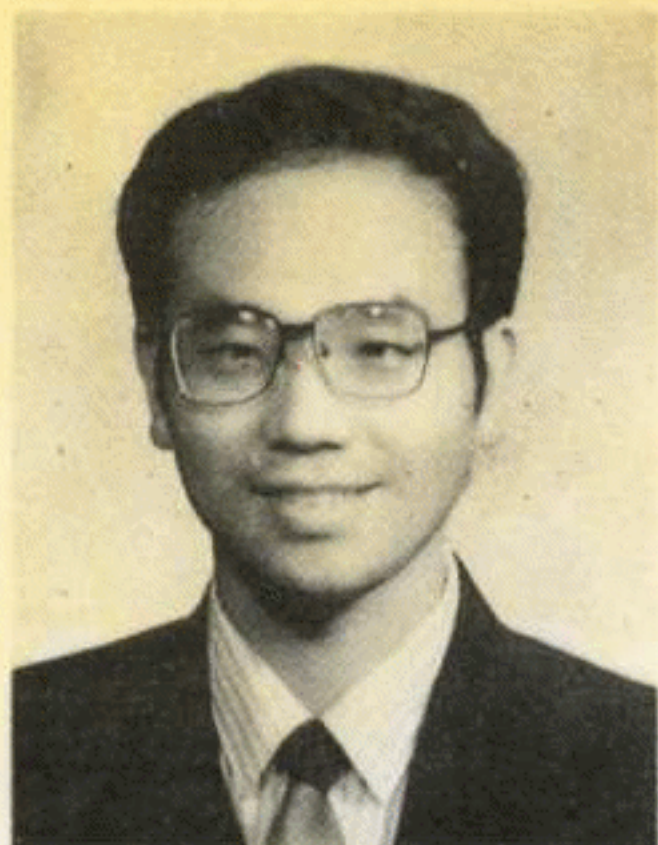
(法)艾田蒲 著
许 钧 钱林森 译
许 钧 校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之欧洲

De la sinophilie à la sinophobie

下





译者简介

许钧，男，1954年生，浙江衢州人。1975年毕业于南京外语学院，1976—1978年留学法国，1988年获南京大学法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现任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教授，并为全国法国文学研究会理事，法国国际翻译中心成员，中国作家协会江苏分会会员。已翻译出版法国文学与社科著作20余种，在国内外发表法语与翻译理论研究论文近50篇。著有《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论翻译层次》、《论文学翻译再创造的度》等。译有《名士风流》、《月神园》、《诉讼笔录》、《追忆似水年华》（卷四，合译）、《荒唐的游戏》等。并参与多部辞典编撰工作，校定译著多部。



译者简介

钱林森，江苏泰兴人，1937年12月生。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长期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文学教学与研究，曾先后多次受聘赴金边王家大学、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学院、高等翻译学校等院校讲学，现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并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理事、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理事、江苏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独立或跟友人合译过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埃尔韦·巴赞(Hervé Bazin)、亨利·特洛亚(Henri Troyat)、勒·克莱齐奥(J·M·G·Le Clézio)等人的多部小说和《中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法文版)，发表过中法比较文化(文学)论文数十篇，并有《中国文学在法国》、《牧女与蚕娘》、《中外文学姻缘》等专著出版。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项目“法国作家与中国”研究课题。

南京大学比较文学丛书



下

ETIEMBLE

L'Europe chino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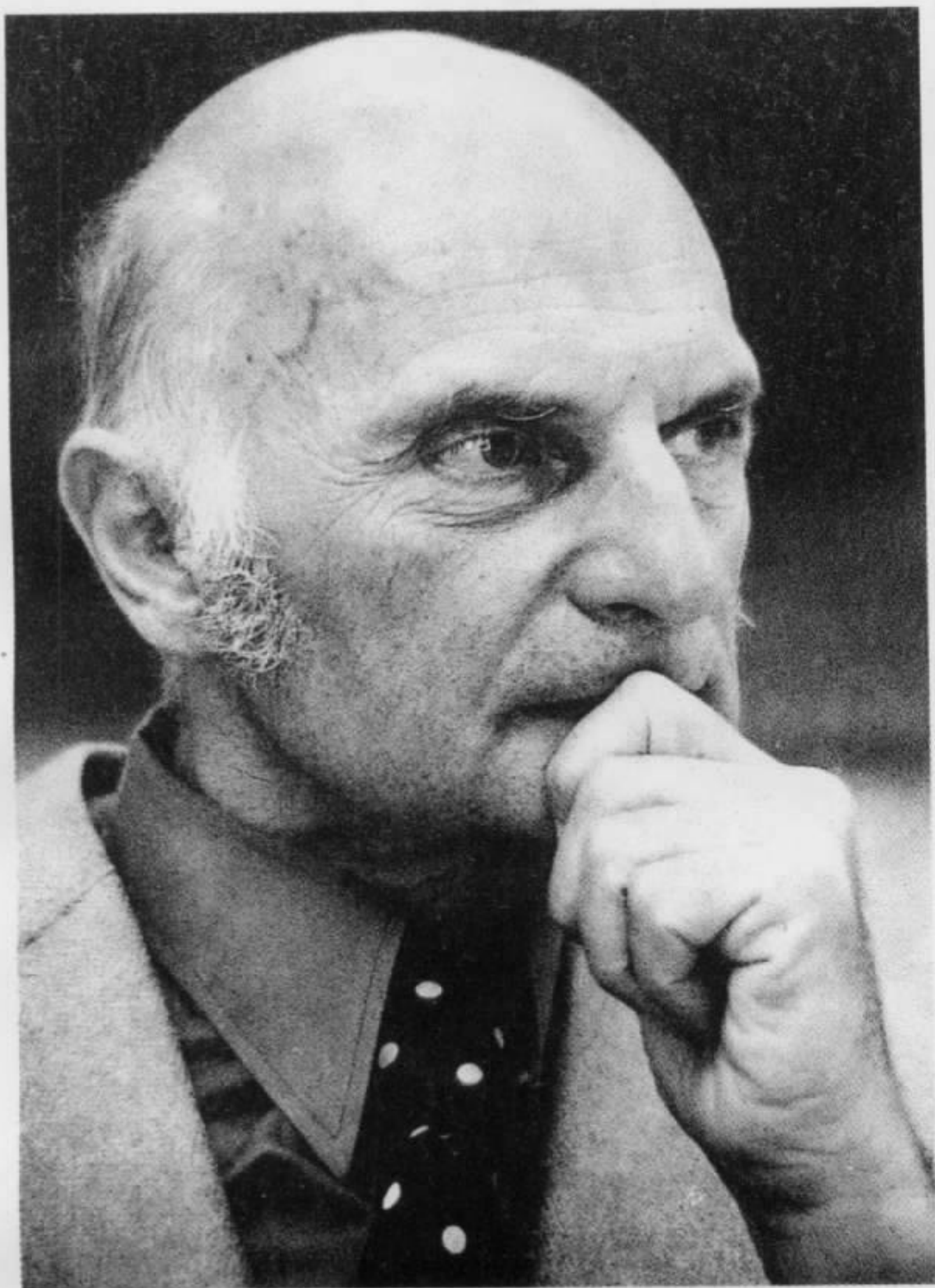
II

De La sinophilie à la sinophobie

本书根据法国 Gallimard 出版社 1989 年版本译出

本书出版得到法国外交部资助

OUVRAGE PUBLIE AVEC LE COUCOURS DU
MINISTERE DES AFFAIRES ETRANGERES DE FRANCE



艾田蒲像（雅克·罗贝尔 摄）

艾田蒲（Rene Etiemble, 1909— ），法国当代知名作家、比较文学大师，巴黎索尔邦大学名誉教授，法国四级荣誉勋位、一级教育勋章和首届巴尔桑比较学基金奖获得者。著述宏富，除文学创作外，主要的文学评论有：《兰波的神话》（多卷）、《文学的卫生》（多卷）、《真正的罪恶》等，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方面的著述有：《比较不是理由》、《论（真正的）总体文学》、《世界文学论文集》、《中国之欧洲》（两卷）等。

内 容 提 要

在本书的上卷中,艾田蒲先生说明了中国何以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精神上吸引了欧洲,并且在对来自各方面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论证了自罗马帝国到莱布尼茨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在本卷中,艾田蒲先生扼要论述了欧洲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其中,对孟德斯鸠和伏尔泰这两个启蒙思想家在這一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比较详尽的研究。作者还尽可能全面地分析了“中国孤儿”这一主题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戏剧中的演变情况。作者认为,“欧洲中心论”是错误的,“光自东方来”也有偏颇。思想的传播是双向的,欧洲在认可中国的同时,也必然会将自已介绍给中国。

关于耶稣会传教团，狄德罗确有清醒的认识。

“他：〔…〕外国神祇谦恭地在当地的偶像旁就座；他渐渐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一天，他用肘猛推同座；啪嗒一声，偶像滚落在地。人们说耶稣会士就是这样让基督教在中国和印度立住了脚跟。不管冉森派教徒怎么议论，在我看来，这种悄然无声，不流血，不伤人，也不揪一绺头发而达到自己目的的策略是最好的。——我：您方才所说的一切，差不多是有道理的。”

狄德罗著《拉摩的侄子》

R·德斯纳诠释

J·瓦尔洛和 M·罗伦斯序

巴黎，社会出版社，1972年，第166页

上卷概要——代题铭	(1)
前言	(1)

**第一部 罗马教廷否认耶稣会士
眼中的中国之欧洲**

第一章 图尔依事件结局不妙	(3)
第二章 梅扎巴尔巴在中国与伏尔泰的缄默	(10)
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中国	(24)
第四章 欧洲仍在中国化	(49)
第五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1)	(65)
第六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2)	(80)

**第二部 17 和 18 世纪欧洲戏剧中
的几个中国侧面**

第七章 伊丽莎白戏剧	(97)
第八章 司马迁的《中国孤儿》	(117)
第九章 纪君祥的《中国孤儿》	(128)
第十章 从纪君祥到伏尔泰	(142)

第十一章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156)
第十二章	《中国孤儿》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 ·····	(179)

第三部 仰慕中国的伏尔泰

第十三章	伏尔泰及其消息来源·····	(201)
第十四章	伏尔泰与中国纪年表(1) ——问题是如何提出的·····	(216)
第十五章	伏尔泰与中国纪年表(2) ——伏尔泰的答案·····	(231)
第十六章	伏尔泰与孔夫子·····	(246)
第十七章	伏尔泰, 中国政治与风俗(1)·····	(265)
第十八章	伏尔泰, 中国政治与风俗(2)·····	(281)
第十九章	将无耻之徒击垮在中国之下·····	(295)

第四部 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

第二十章	德·阿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	(311)
第二十一章	重农主义者与中国·····	(325)
第二十二章	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	(338)
第二十三章	18 世纪的一部教材和一部 词典中介绍的中国·····	(353)
第二十四章	这部《词典》是否完备? ·····	(368)
结论	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	(382)
译后记	·····	(394)
人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	(399)
书刊名中外文对照表	·····	(453)

无论是偶尔翻阅还是出于需要，凡想通过本卷接触我的《中国之欧洲》的读者，请参阅我推出上卷时所写的那段话：倘若想要像约瑟·尼达姆^①编撰《中国的科学与文明》^②那部伟大著作那样进行研究，那至少需要有一个研究班子，用10年时间才能把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作个全面的总结，这恐怕要追溯到希腊文明年代，当时是通过丝绸之路，还要追溯到罗马文明年代，罗马的商船曾在太平洋海岸停泊，以获取中国丝绸。简言之，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试图指明在中国的传教士们通过他们的情况汇报给欧洲带来的一切，诸如中国的技术、思想和艺术等，那是因为我盼动一下我梦想成立的那个研究班子，希望他们能超越我的研究水平。这里，我试图说明的，只是在18世纪，尽管人们酷爱中国的工艺品，而且还发现了中国的音乐、戏剧和有关中国科学的某些方面的情况，但未能挡住欧洲的变化，在孟德斯鸠的著作中，我们已经隐约地看到欧洲从对中国的仰慕到对中国的排斥这一变化，由于某些“启蒙”哲学家的作用，对中国的排斥后来发展到了极致，在这些先驱之

① 即李约瑟。——译注

② 一译《中国科学技术史》。——译注

后,紧随而上的是炮舰,在英国成功地把拿破仑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之后,一艘艘炮舰无耻地轰击帝国,把她沦为殖民地,欧洲实在忘恩负义,因为正是这个帝国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丰富着欧洲的思想、科学和艺术。人们自会明白,我之所以坚持己见,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一中国之欧洲的某些侧面进行研究,原因正在于此。尽管我了解在 18 世纪传给欧洲人的那部伟大的中国植物志《本草纲目》的历史,尽管我也拜读过 E·罗沙·德·拉瓦莱(Elisabeth Rochat de la Vallée)有关这一问题的精彩报告^①,但我并不准备在此重新叙述它的来龙去脉!倘若我有心想就欧洲各国的情况,按国别发表类似俄国人在 1969 版发表的研究成果(我在上卷的序中已经提及,俄国人发表了两大卷有关中俄关系的资料与文件),那至少需要 10 卷的篇幅,需要付出 20 余年的心血。仅就英国而言,自我发现丹尼尔·笛福的断言之后所进行的调查,以及其他人的,如欧文·奥尔德里奇(Owen Aldrige)的调查结果,哪怕再简缩,也可轻而易举地写上 30 来页。笛福曾断言,若将中国与他的国家和国民作一比较,那中国便会自我暴露,给人以极不光彩的形象,中国人程受颐(Ch'en shou-yi)于 1935 年在天津发表了《丹尼尔·笛福——对中国的一位严厉的批评家》,公开了这一所谓的形象。在这之后,我还看过不少有关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中国献给英国人的精神礼物和其他赠品的文章。关于儒家在 18 世纪的英国的情况,我自然在《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尚蒂伊,1977 年)中读过埃

① 见《中国植物志(本草纲目)在 18 世纪流传欧洲的始末》,载《第三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1988,尚蒂伊),纯文学出版社,《Cathasia》论丛,1988 年,第 177—194 页。

德蒙·利茨(Edmund Leites)的那篇论文^①。

我也没有忽视欧文·奥尔德里奇的论文,他是关心远亚与欧洲关系的为数不多的几位比较文化专家中的一位,他的那篇题为《启蒙时代的英国文学中对中国的看法》的论文见于1986年问世的《世界文学的重现:亚洲与西方之研究》^②。我们怎会忘记 John T. 普拉特(John T. Pratt)在《中国与不列颠》一书中明智地承认中国所赠与欧洲的一切,比如茶,那是在17世纪初由荷兰商人介绍给欧洲人的。普拉特毫不犹豫地写道,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有负于那个如此遥远的国度。对一个英国人来说,没有茶的日子,该是多么“烦闷”(在那部英语著作中,用的是法语的“ennui”一词)啊!普拉特也没有忘记在17、18世纪“流入欧洲的那些数量不断增加的”中国手工艺品,诸如瓷器、漆器、玉器及景泰蓝等。他同样也知道中国从来没有厚颜无耻地把人类看作“宇宙的最终目的”(the ultimate purpose of the universe),并为之而感到庆幸;他也许也有失误之处,如他曾自问为何“她〔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会如此之小”(it is not easy to understand why her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world has been so light),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得出与此较为矛盾的看法,他承认一种“对来自中国的东西——包括哲学——的狂爱之潮席卷了欧洲,尤其是18世纪的法国”(a craze for Chinese things——including philosophy——swept Europe, and particularly Franc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后来,这致使普拉特为皮勒芒特(Pillement)于1770年出版的《中国茅屋》大声叫好。他还有

① 《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尚蒂伊,1977年),纯文学出版社,《Cathasia》论丛,1980年,第65—81页。

② 此研究文集的单行本得益于他,他的文章的页码为1—25页。亚太议员联盟亚太文化中心出版,第14卷第2号,1986年。

别的失误,那就是他认为这一狂爱中国工艺品的欧洲对孔子却似知非知:然而在1691年,就在伦敦出现了《中国哲学家孔子的伦理学》,实际上,这部书不过是三年前在阿姆斯特丹问世的那部法文名叫《La morale de Confucius, philosophe de la Chine》的著作的转译本。此外,埃德蒙·利茨也分别以英法文发表过《在18世纪的英国的儒家:自然伦理与社会改革》一文^①。

1977的那届研讨会特别提供了一份在美国完成的有关中国在启蒙时代的作用的研究成果录,同时还提供了一份题为《启蒙时代对中国的理解:孟德斯鸠与伏尔泰》的研究成果。尽管我对沃尔特·沃森(Walter Watson)的报告并不完全赞同,但不管谁接触类似的研究,这一题目是绝对成立的。证据之一就是在30年前,我在巴黎大学执教的初期就涉及过这一题目。在此书的上卷中,我说明了中国何以通过耶稣会的传教士们在精神上吸引了欧洲,而在本卷中,我则要扼要地叙述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构成了这一具有双重价值的中国的两个支柱。其中,我还要尽可能谈一谈“中国孤儿”这一主题在欧洲几个国家的戏剧中的演变情况。倘若人们认为智慧之光的传播总是由东向西进行,并认为“光自东方来”(ex oriente lux)这一格言总是千真万确的话,那么对思想的传播史就有可能完全不了解了。如果说中国人给予了我们许多的话,那他们至少也接受了一些东西。毫无疑问,耶稣会士们所做的一切,与其说是在欧洲介绍了中国,倒不如说是把西方介绍给了中国人;但是,若我们抹杀了他们为介绍中国思想所作的贡献,那就大错特错了。韦拉朗先生(M. Verhaeren)给北京的

① 《第二届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尚蒂伊,1977年),纯文学出版社,《Cathasia》论丛,1980年。法文本见51—64页,英文本见65—81页。英文本中有一些注释,但在法文本中则没有。

那些耶稣会士们一点一点搜集而来的图书精心编写了一份目录，并且公开出版，耶稣会的雷迪夫神父(P. Rétif)在一部名叫《在中国的一座复兴书馆》^①的著作中对韦拉朗先生所编的图书目录的价值作了评价。

这一“北堂书馆”拥有耶稣会士们认为对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很有用处的各种欧洲图书：“它在两个互不了解的世界之间起到了联结线的作用：对远亚而言，它为传播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出了贡献；而对西方来说，它则为介绍远东的人文财富给予了间接的帮助^②。”

圣方济各·沙勿略本人对这座藏书馆的图书是有选择的，他曾在远东给上司写信：“我希望这些教友不要对天文学一无所知〔…〕切勿把不具备渊博学识的神父派往日本或中国。”后来，利马窦坚持按他前任的意图行事，有幸实现了圣方济各·沙勿略的计划。他每次给欧洲写信，要求给他的书馆提供图书，给予帮助时，他总是再三强调，要求得到类别尽可能丰富繁多的图书。“他因此而想完善自己的知识，引起与他过从甚密的中国文人的钦佩与好奇^③。”在他看来，好奇与钦佩是人间可把不信教之人引向上帝的众多道路中的两条。在现存的《北堂书馆图书目录》中，还可找到当初建馆时第一批藏书中的几部图书，书馆建于1605年，据某些学者，确切的日期为1605年8月27日。常来拜访利马窦神父的中国文人确实对这座藏书馆惊叹不已，里面藏有西方有关天文学、几何学和钟表制作术的论著，也有宗教、哲学、伦理和历史书籍。利马窦

① 请参见《北堂书馆图书目录》，北京，遣使会会士印刷社，1944—1949，有关这一专题，请参阅J·代尔涅的文章：《震旦大学学报》，上海，1949年，第262页。

② 见雷迪夫一书第113页。

③ 见雷迪夫一书第114页。

死后，龙华民神父虽然在某些方面否认了他的前任的学说（尤其在有关中国某些玄学概念的含义方面），但有关北堂藏书馆的事业却是继承了下来。正是为了这一事业（但并非仅仅为此事业），他把金尼阁派回法国，后来，金尼阁通过海路把近七千册西方图书运到了澳门，继而又通过水路运送这批图书。在几个世纪中，这座藏书馆历尽了劫难。1644年，满族人灭了明朝，火烧北京，然而大火中耶稣会士们的藏书却丝毫未损，雷迪夫神父高兴地称之为“几乎是奇迹”。可是1812年那场大火，他却不敢再称为“奇迹”了，东堂的藏书馆在大火中损失惨重，当时，东堂是葡萄牙耶稣会士们的第二个传教要地的常驻点。在19世纪，局势变得动荡不安，耶稣会士们曾一度把藏书馆残存的图书委托给俄国的东正教传教团保管；三十二年后，即在1860年才重新收回。1862年，蒂埃里（M. Thierry）编写了一个手抄目录，全部藏书共计5930册。现存5133册。在17世纪，一座拥有七八千册图书的藏书馆，我们假设是由各类图书组成的，那它足以使人们对欧洲的思想、宗教和科学有个概要的认识。由于我在上文刚刚提及的那些事变的缘故，我们无法一一弄清中国人在耶稣会士们那里有可能发现的一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有个近似的了解。在书目中，没有列入培根、伯麦（Jakob Boehme）、布鲁诺（Giordano Bruno）、霍布斯（Hobbes）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的作品；对此，谁都不会感到奇怪。无论是实证思想，异端的神秘主义，还是当时要受到焚烧制裁的严格的理性思想，都无助于实现耶稣会士的目的。因此，你也别指望在书目中看到路德和加尔文的书。但是，《为雷蒙德·塞朋德辩护》^①却使蒙田得以进入中国：在北堂藏书馆里，可以读到“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先驱库

① 此为蒙田《随笔集》中的一章，抨击了禁欲主义和教条主义。——译注

萨的尼古拉斯(Nicolas de Cuse)、哲人、名医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e)、卡尔达诺(Jérôme Cardan 1501—1576)、勇敢的柏拉图主义哲学家乔凡尼(Giovanni Pic de La Mirandole 1463—1606)、罗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 1455—1522)以及其他学者的书籍,如克雷芒八世的医生切萨皮诺(André Césalpin)、卢万公教大学教授利普修斯(Juste Lipse 1547—1606)、素以言辞尖刻闻名的瓦拉(Laurant Valla 1407—1459)和皮埃尔·德·拉拉梅(Pierre de la Ramée)等”。伊拉斯谟的大名也列在书目上,上面还列有勒菲弗尔·戴塔普尔(Lefèvre d'Étaples)的名字。雷迪夫神父还告诉我们被列入教廷禁书目录的有关图书在这座藏书馆里全都经过“评注与校改”。这是自然的事。此外,耶稣会士的护教论主要是建立在博学者和能工巧匠的成就之上,而不是以哲学家为基础。在天文、数学、医学、自然科学方面,他们的藏书馆给中国人提供的几乎是当时的西方世界所创造的一切最优秀的成果;凡是与航行、建桥、地球仪、自动木偶以及风车制作有关的书籍,他们无不热烈欢迎;甚至对有关介绍电力基础知识的书籍,也同样如此,所有这一切无不给神父们提供帮助,A、M、D、G^①。

人们也许希望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我相信若在中国进行认真的研究,那定将有助于发现这一藏书馆所起的作用: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或改变了中国的科学与思想的发展方向。目前,我们只能作一些推测。我们仅仅知道穆斯林和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对这门迫使他们修改历法,并因此而改变世界时序的外国科学,并不是痛痛快快地就接受的。为了战胜非基督教徒,在北京的那些耶稣会士们给伽利略写信,在许诺保守秘密的同时,请伽利略为他们计算某部中国

① 拉丁文,意为“为了上帝的更大荣耀”。——译注